

有距离的共在：现代个体的边界与空间

李彦培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5年11月11日；录用日期：2025年12月2日；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5日

摘要

随着前现代社会个体间稳固的血缘、地缘联系的解体，进入现代社会，个体在享受连接社群便利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了划定自我边界的权力，与之而来的是自我边界的模糊与精神空间的压缩。文章从哲学与社会学视角出发，试图探讨个体如何在社群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感，以维护自我认同与精神独立。通过分析黑格尔的承认理论、齐美尔的社会形式理论以及福柯的自我技术，指出“有距离的共在”并非疏离，而是个体性得以存续的必要条件。文章主张，在现代高度连接的社群中，个体应通过反思性地参与，实现自我与社群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个体性，社群，边界，距离，自我技术

Distant Coexistence: Boundaries and Space of the Modern Individual

Yanpei Li

School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Jiangsu

Received: November 11, 2025; accepted: December 2, 2025; published: December 15, 2025

Abstract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ble blood and geographical ties between individuals in pre-modern society, entry into modern society has allowed individuals to enjoy the convenience of connected communities while, often imperceptibly, relinquishing the power to delineate their own boundaries. This has led to blurred self-boundaries and a compression of mental space. From philosophical and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ow individuals can maintain an appropriate sense of distance within communities to preserve self-identity and mental independence. By analyzing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Simmel's theory of social forms, and Foucault's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t argues that “being-together-at-a-distance” is not alienation bu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sustenance of individuality.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in highly connected modern communities, individuals should achieve a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self and the community through reflective participation.

Keywords

Individuality, Community, Boundary, Distanc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启蒙运动所高扬的个体自决精神，在笛卡尔“我思”与康德“先验自我”的哲学奠基下，“自我”从依附于外部权威的客体，上升为了一个独立、自足的主体。笛卡尔通过“我思故我在”确立的内在化了的主体性，以及其在方法论中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无疑是为现代个体了解自身能动性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转向。然而，这种不假外求的原子化自我因疏离了社会纽带而容易陷入存在的虚无，由此引发了哲学上的反思。黑格尔及其当代继承者霍耐特提出的“承认理论”，正是为了应对这一孤立的自我的问题。该理论指出，自我的意识并非与生俱来的内部事实，而是必须通过与他者的相遇、斗争及妥协并最终获得其承认方能确立的事物。于是，真实的自我便不再是孤立的“我”，而是存在于关系网络中的“社会中的我”或者说“我们中的我”。“通过互动，个人的思想和理解被转化为共享的意义，从而产生用于诠释的‘超个人’框架。”^[1]而框架在提供诠释工具的同时，也限定了诠释的范围。它让我们习惯于用框架内的概念思考，而可能对框架外的可能性视而不见或者边缘化。也即，这种以“承认”为基石构建的自我，在克服了原子化孤独的同时，也可能悄然构筑起另一座牢笼。个体通过持续的互动共同创造了“我们”，而当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完全维系于“我们”的承认之时，社群便从滋养个体的土壤，异化为吞噬个性的牢笼。自我为了获取持续的认可，不得不持续调整自身以契合社群的期待，从而逐步丧失构建自边缘界的精神勇气与物理空间，个体性也在“我们”的温暖拥抱中被悄然消解，自我沦为一个不断回应他者目光、失去内在稳固内核的空洞象征。

个体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哲学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经典社会理论家中，涂尔干强调社会整合在个体行为规范中的作用，指出个体应在遵从集体意识的过程中实现社会化^[2]。而与之相对的，韦伯则关注现代理性化进程中个体所面临的结构化困境，重点关注工具理性对个体价值的挤压^[3]。这两种视角分别从集体与个体角度揭示了社会对个体个性的塑造与限制。进入20世纪后，符号互动论进一步丰富了这一讨论，米德提出“自我”源于社会互动中的“主我”与“客我”的对话，强调个体在社会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关自我的认知^[4]。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则指出个体在社会舞台上的自我呈现策略，认为个体性往往是在社会外部期待与自我内在表达之间的动态博弈中建构的^[5]。当代研究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认为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既受制约但同时也具有个体能动性^[6]。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普遍认同个体性与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但对如何在这一张力中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与社会的整合性，仍缺乏系统的伦理——实践路径。本文提出的“有距离的共在”，正是在此理论脉络下对个体在社会中应当如何的一种回应与推进。在现代社群的复杂网络中建构健全的自我，必须警惕无所不在的承认的诱惑。在个体面对融入“我们”的情况时，有意识地后撤一步，划出一道属于自

我的边界，这不是向笛卡尔式的自我的退却，而是为了确立且保有一个不必被完全看见、无需被持续认可的内在空间。唯有在此基础上，个体才能避免在群体的镜像中迷失，实现一种既在社群之中，又保有自身尊严与自由的“有距离的共在”。

2. 社群中的自我：从“我们中的我”到“有距离的我”

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强调，个体自我意识的形成依赖于他者的承认，从而建构起“我们中的我”。“一个人伤害他人是不承认他人具有与自己同样的不能被伤害的权利，由此遭到的反抗则是这种不承认的命运般的结果，而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不被承认，自己生命的残缺和不自由。”^[7]然而，这种相互承认的自我意识往往伴随着对个体独特性的消解，正如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所暗示的，个体若完全沉浸于社群共识之中，则易沦为“洞穴之我”，失去对自我真实面貌的洞察。“任何一个‘我们’，都必然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我们’和拥有‘我们’。正是‘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看待问题的方式，难免成为束缚人们的‘洞穴’，使得其中的每个‘自我’只能按照该社群的共同价值取向思考问题，就像洞穴中的囚徒一样，只能面壁看到一个个事物的影子，所持有的各种一致性见识只能是对影子表达的共同意见，即‘我们中的我’所形成的普遍自我意识有可能是‘洞穴之见’。”^[8]

在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中，自我意识的生成并非一个孤独的内省过程，而是必须经历一场“为承认而斗争”的Intersubjectivity冒险。自我意识的初期阶段是缺乏内容的，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自我同一，而在与另一个自我意识的互动中看到自身的映现，并最终达成相互的、平等的承认，才能从抽象的“自我”升华为具有现实性与普遍性的“我们中的我”。这一“我们”构成了个体认同的伦理基础，为自我认知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性根基，他者不是自我的障碍，而是自我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通过与他者充满张力的相遇和最终的和解，在一种相互依赖又彼此尊重的关系网络中，找到自己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位置。“我认识到一切东西都是我的东西，都是自我，我把每个客体都理解为我本身所是的那个东西的体系中的一个环节，简言之在于我在同一个意识中拥有自我和世界，在世界中重新找到我自己。”^[9]

然而，这种以承认为根基的自我形态，潜藏着一种深刻的辩证陷阱：对承认的过度沉浸，可能导致个体性在“我们”的同一性中被消解。当自我的价值与意义完全维系于他者的认可之时，个体便面临着将外部群体的视角内化为自我审判的唯一标准的危险。为了持续获得这种承认，自我就会不断地调整自身以契合“我们”的期待，从而可能丧失其内在的、独特的立场。此时，那个最初为了确证自由而进入的承认关系，反而可能演变为一个隐形的承认的牢笼，个体在其中交出了构建自身精神边界的权利。

“如果说社会团结是内嵌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目标，那么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就成为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10]因此，一个健全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其养成不仅在于能够成功地融入“我们”，更在于具备从承认网络中反思性抽离的意识和能力。这种抽离，并非要退回到斗争前的孤立状态，而是要在一个普遍关联的世界中，有意识地守护一片不受承认逻辑完全支配的内在空间。唯有通过确立这种“反思性的距离”，个体才能避免沦为主流意见的盲目跟随者，才能在保有自身完整性的前提下，与社群达成一种更为成熟、更为自由的有距离的共在。

3. 边界的意义：个体空间的建构与守护

边界不仅是个体与外界的分隔，更是自我认同的保障。自我认同不是一瞬间完成的，它需要在安静、安全的环境中，通过持续的自我对话和内省来慢慢形成。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区分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指出私人空间是个体思考、感受与恢复自我的场所。没有边界，个体将永远处于对

外界刺激的应激反应中，失去与真实自我连接的机会。泰勒也指出“我思的重要性，从‘内在的’，从我们自己观念的特点出发，而不是从外在的事物出发证明上帝存在的核心作用……我们可以说，笛卡尔把道德根源置于我们内心……借此我们再也不，或至少绝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把自己与外在于我们的道德根源联系起来了。一种重要的力量已经被内在化了”^[11]。

在齐美尔的社会学视域下，社会并非一个实体，而是由个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形式所编织的动态之网。自我，便是在这张网的每一个结点上生成与存在的，与黑格尔那种追求普遍承认的终极和解不同，齐美尔认为，个体的本质恰恰在于其与社会力量之间保持的微妙距离。“在与他人的相互交流运行之后，主体有意识地去选择排斥交流。孤独因此不是人际关系或说社会的缺席，而是它的一种独特产物。孤独与社会性在结果上是相对立的，但从形式上说又是一致的，它的出现也是与社会联系发生关系的产物。”^[12]

齐美尔提出的“距离”概念，是理解个体与社群关系的关键。他认为，并非联系得越紧密，个体价值就实现得越充分，相反，现代人的自由与个性，表现在对社交圈的调节之中。个体通过与他人、与潮流、与主流价值观保持一种创造性的、可变的距离，来定义“我是谁”。这种距离不是冷漠的退缩，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自我边界的社群性行为，它使得个体既能参与社会，又能避免被社会完全同化。“现代社会货币经济的普及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增强了人造物固有的异化趋势，就连个体有意识创造的客体在产生之后都会有自己独立的客观存在和逻辑，更何况劳动分工体制下每一件人造产品都是许多人劳动的结果，产品集中了许多人的能量，缺乏容易被个体生命吸收融合的个性，所以人工产品越来越难与个体生命融合，以促进个体生命统一体的完善。而且，在劳动分工的生产模式下，生产资料、劳动和劳动产品全都不属于劳动者，均以陌异的客观性与个体对立，那些原本为个体发展完善所造之物，最终都成为自成一体的客观体系，遵循着客观精神的准则，好像不可抗拒的命运般无情地面对着个体，货币经济正是这种客观体系的一个典型代表。”^[13]

这种对距离的需求，在大都市生活中体现得最为极致。齐美尔描绘的都市人，以其矜持、冷漠和理性计算的态度，构筑了一道心理防线，这并非天性凉薄，而是个体在面对过度神经刺激和纷繁复杂的社会事件的冲击时，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都市的礼貌，正是一种制度化的距离机制，它允许人们在物理空间上紧密相邻，却在精神空间上互不侵犯，从而为个体性保留了一片得以栖息的空间。拉图尔也指出“现代人确实感受到时间成为一支不可逆转的箭矢、一种资本化、一种进步。但是，由于这种时间性又被强加在一个运转机制全然不同的时间体制上，因此，不和谐的迹象也在不断增加。”^[14]“自我以时间性投射的方式设置意向目标，把自己投向了将来可能实现目标的自我。在行动的过程之中，自我带着明确的目标设定，自身活跃在当下。”^[15]

“对于外在事物的顾虑，应该只是像件披在圣徒肩上的‘随时可以卸下的薄斗篷’。然而，命运却使得这斗篷变成了钢铁般的牢笼。”^[16]在现代社交媒体的压力下，个体边界不断被侵蚀，也常常陷入过度暴露与情感透支的困境。因此，齐美尔所启示的，并非如何彻底地融入或脱离社群，而是如何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优雅地调节与他人之间的亲疏关系，真正的个体性，不在于个体归属于多少个“我们”之中，而在于个体是否有能力、有意识地在每一个“我们”之中，划定并守护一片专属于自身的、不可侵犯的内在边界与自由空间。这种“有距离的共在”，正是现代个体在社交网络中保持灵魂自主性的智慧。重建个体边界，不仅是自我保护的策略，更是自我实现的重要前提。

4. 实践自我技术：在社群中保持清醒与独立

在福柯的谱系学视野中，现代社会的“自我”并非一个等待被发现的内在核心，而是各种权力技术与话语实践所建构的产物。社群，远非一个温情脉脉的承认之所，它首先是一个巨大的、渗透着规训权

力的场域。这套权力机制通过无处不在的凝视与规范，持续不断地对个体的身体、行为乃至欲望进行编码、分类和矫正，最终生产出温顺且听话有用的工具个体。因此，福柯所论述的个体与社群的关系，首先是一种在权力场域中的位置关系。

在福柯的“所有这些著作基本上都在设问：当人发现自己是癫痫者、病人时，当人意识到自己是活着、讲着话并劳动着的存在时，当人作为罪人进行自我判断和惩罚时，当人作为欲望主体时，人是通过哪些真相游戏来思考自己的存在？而这样的询问明显具有实证性、历史性和科学性。福柯的主体无疑是一种‘实证主义’的主体”^[17]。在此背景下，“有距离的共在”这一命题，便具有了全新的、革命性的含义。它不再仅仅是心理上的疏离，而是一种针对权力操控的战术性抵抗，其实践核心，在于福柯晚年所聚焦的“自我技术”，在《性经验史》第二、三卷中，福柯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伦理实践。他指出，古希腊罗马人通过自我控制与生活艺术，将自身建构为一个伦理主体。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伦理”核心不是服从规范，而是“自我关注”，是主体面向自身的关系形式，即个体通过一套有意识的、往往承袭自古代的伦理实践，来作用于自身，从而改变、净化、转化自身，以期达成某种存在状态。这种实践的目标，是进行一场福柯所称的“生存美学”实验，它要求个体不再将自身视为一个必须符合某种普遍标准的、等待被承认的客体，而是将自己当作一件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来创造，通过主动的、审美的自我塑造，个体得以从权力所规定的客体位置中实现某种程度的挣脱，从而创造性地构成自身的主体地位。

“我们当下的境况是，将一切真理和精神性都打碎的重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人都可以成为知识领袖的时代，虚拟和真实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已经大于对自由行动的期待。同时，福柯的生存美学正在被很多人曲解为沉醉于审美领域，现代人专注于自我、外观与身体，但充满了焦虑。”^[18]实际上，实践自我技术的主体已经不再只是权力话语的产物，在伦理和实践中主动地塑造自身的过程，使得个体成为符合某种规范性和主体。因此，在福柯的图景中，“有距离的共在”的本质，是一种持续的、以自身为对象的伦理——政治实践，它不是为了最终与社群和解，而是为了在权力的包围中，通过主动的自我构型，去赢回那片刻的、属于自身的自由。通过这些技术，个体既不断绝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会丧失自我的独立性，从而实现在群体中独处的智慧。

5. 结语：走向有距离的共在

个体与社群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相互成全的辩证关系。真正的社群健康，不在于个体完全融入，而在于个体既能在其中保有自我，又能以独立的姿态参与到社群的共建中去。个体需要社群，也需要独处的空间。在信息高度连接的今天，学会在社群中保持距离，是个体在这个时代生存的智慧与艺术。

“人是社会动物，只能在社会和国家中实现其真正的自我”且“社会生活是人类存在的目标或目的。”^[19]而从黑格尔“为承认而斗争”的伦理自我，到齐美尔“距离的辩证法”中的社交自我，再到福柯“自我技术”下的美学自我，现代性进程中个体与社群的关系呈现出不断的递进发展与进步创新。黑格尔将自我的实现置于主体间相互承认的进程中，个体通过他者确证自身，最终达成“我们就是我们”的伦理实体。然而，这种对承认的渴求若不加以反思，容易使个体消融于社群的“普遍性”之中，沦为“我们”的附庸。继而，齐美尔以其社会形式理论推进了这一思考。齐美尔指出，现代人并非通过完全融入社群，而是通过精细调节与社会的心理距离来实现自我，都市生活中的社交距离，是个体在面对过度刺激的社会信息冲击时，为守护内心自由而构筑的柔性边界。这种“有距离的共在”，成为个体在密集社交网络下维系人格独立的重要智慧。到了福柯这里，这一议题则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福柯看来，现代社会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规训技术在塑造着个体并使其标准化。此时，“保持距离”不再仅是心理调节，更升华为一种抵抗权力的实际行动，个体通过“自我技术”主动将自身塑造成艺术品——在对主流话语的冷静怀疑中，在对规范的内化保持持续警觉中，开辟出属于自身的生存空间。

这条思想脉络揭示出一个深刻的现代命题：真正的个体性，不在于完全脱离社群，也不在于完全融入社群，而在于要具备在联结中划定边界、在规范中创造个性、在普遍性中守护特殊的辩证能力。从黑格尔的“承认”到齐美尔的“距离”，再到福柯的“自我技术”，展现的正是现代个体在日益紧密的社交网络中，为捍卫精神领地而进行的不懈探索，也即当代真正的自我认同是“在生存时间里，从存在深处发生了突破，人与历史获得了同一，感受到了永恒，这是对于宇宙时间和历史时间的战胜，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此。这种历史观赋予每个个体以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每个个体都是唯一的。他不作为工具；他就是目的本身；他以自己独特的体验与历史、与永恒相连”^[20]。

参考文献

- [1] Frödin, O. (2025) Meaning and Cognition: A Unified Approach to Meaning-Making. *Sociological Theory*, **43**, 211-237. <https://doi.org/10.1177/07352751251346160>
- [2] [法]涂尔干.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王贊,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
- [3] [德]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M]. 钱永祥, 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 [4] [美]乔治·米德. 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 [5] [美]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 冯钢,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7] 王福生.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四副面孔[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4): 99-105.
- [8] 曹孟勤. 走出自我的“洞穴之见” [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4): 15-24.
- [9] [德]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219-220.
- [10] 郑莉. 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团结——基于“新部落主义”与“共同体”的思考[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4): 53-61+175.
- [11]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 自我的根源: 现代认同的形成[M]. 韩震,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201-202.
- [12] 王贊. 社会圈层与客观化过程: 齐美尔的现代相对主义立场[J]. 浙江学刊, 2024(1): 35-44+239+2.
- [13] 潘利侠. 冒险与现代性 齐美尔思想与生活图景的冒险内核及其现代性意涵[J]. 社会, 2022, 42(4): 1-30.
- [14] [法]布鲁诺·拉图尔. 我们从未现代过: 对称性人类学论集[M]. 刘鹏, 安涅思,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 141.
- [15] 赵猛. 自我意识与时间化的现象学[J]. 世界哲学, 2025(5): 55-66+208.
- [16]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康乐, 简惠美,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9: 179.
- [17] 莫伟民. 主体的真相——福柯与主体哲学[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3): 51-64+221.
- [18] 朱雯玲. 如何审视现代性“自我”?——把握社会理论中的自我塑造实践[J]. 浙江学刊, 2025(2): 41-50+239+2.
- [19] [美]梯利. [美]伍德增补: 西方哲学史: 增补修订版[M]. 葛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97.
- [20] 车玉玲. 反启蒙与新文明探索: 俄罗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思想路径[J]. 哲学研究, 2022(2): 35-44.